汉字美学谱系的建构及意义

朱崇才

内容提要 汉字作为“有益的传统”，其谱系在文化转型中只能渐进地、部分地重构。在既有的“意义”、“部首”、“声韵”三大类汉字谱系的基础上，可以建构汉字的美学谱系。这一谱系可按照分类学的一般方法，分为 Class 系、Family 科、Genus 属、Species 种四层级，在系一级可分为“天人、物象、心象、音象”四系。汉字的美学谱系可用“拓扑结构”描述呈现。汉字美学谱系更能接近汉字创制及发展的“原生态”，可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可为寻绎天人之间的适当平衡提供资源。

关键词 汉字美学谱系 拓扑结构 部首 声韵

朱崇才，南京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教授 210097

21 世纪，作为“也许维系着我们文明的存亡”的“有益的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哈耶克语）[1]，汉字的意义及价值，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上一世纪初以来喧腾百年之久的“废灭汉字”和“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2]，实际已经“废灭”；到如今，汉字仍在使用并将继续使用，“拉丁化”唯一的成果“汉语拼音”则成为汉字的辅助工具。正如哈耶克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观念新研究》中所说：“那种认为人作为一种存在可凭籍其理性而超越他所在的文明的价值观并从外面或一个更高的视角来对其作出判断的空想，只能是一种幻觉。我们必须知道，理性自身也是文明的一部分。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拿一个部分去应对其他部分。就是这个过程也会引发持续不断的互动，以至于在很长时间中可能会改变整体。但是在这一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突发式或完全重新建构整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总是要应用我们现有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本身就是一种演化过程的整体的产物。”[3]周作人在“下水”成为敌族职员之后，也曾别有会心地说：“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词，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

[1]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2、158 页。

[2]1935 年，蔡元培等 688 位中国最有名望的文化人，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提出“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

[3]Hayek, F. A., 1978,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20.这段话中译文见韦森《为什么今天还要重读哈耶克？》，该文发表于“凤凰财经网”，网址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613/12534755_0.shtml；又见其《重读哈耶克·自序》；韦森《重读哈耶克》，〔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卷首。

杨伯峻《论语译注》注释特点论

蔡莱莉　柳　宏

内容提要　儒家经典的传承与历代注疏文本紧密关联。杨伯峻面对新的时代，敏锐地作出适应社会发展的嬗变和转型。其《论语译注》以尊重传统、实事求是、千虑一得的鲜明注释特点，积极探索当代译注体文本形态及注释方法。杨氏之实践及其成果，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挖掘与当代转型，对于今天的文化发展与文化繁荣，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无疑具有启迪意义和参照价值。

关键词　杨伯峻　《论语译注》　儒家精典　注释特点

蔡莱莉，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225002
柳　宏，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225002

儒家经典经久不衰、永恒流淌的生命力，固然与其自身巨大的政治、思想、伦理、文化价值密切相关，无疑亦与其琳琅满目的注疏文本紧紧关联。正是一代代博学鸿儒皓首穷经、爬罗剔抉，不断超越“时代的差异”，对接远古前贤的经典原意，才使得儒家学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纵观两千多年的《论语》诠释，大多笼罩在经学视域，落实到改制图新和科举仕进，催生出章句体、训诂体、义疏体、集注体等文本形态。进入二十世纪，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末代皇帝被推翻了，漫长的封建统治结束了，文言的正统地位亦被白话所取代，《论语》的注疏目标、方法、语体等必须做出与时俱进的调适和改进。

面对一个新的时代，杨伯峻敏锐地发现时代的变化、制度的新生、语体的转变，传统学术无疑需要作出适应时代发展的嬗变和转型。从古籍整理及文化传承的高度，他以《论语译注》[1]为切入口，实践着他的学术追求和文化理想，将“普及和提高”作为《论语译注》的著述目标，大胆探索，打破常规，构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颖框架与图式。杨伯峻《论语译注·例言》第一条云：“在本书中，著者的企图是：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同时，有许多读者想藉自学的方式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本书也能起一些阶梯作用。”杨伯峻《论语译注》之主体无疑是译文和注释，且主体中的注释部分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注释直接为翻译服务，决定着翻译的质量和水平。面对崭新的语体、语境，杨氏紧紧围绕普及与提高的著述目标，突破两千多年的注疏传统，

[1]杨伯峻《论语译注》，成书于 1958 年，本文引用均采用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本。

寂静、想象与对话:现代童年书写的诗学途径

谈凤霞

内容提要 现代童年书写因回望童年生命的创作姿态而生成了独特的诗性艺术质地。在寂静中生发的童年回忆是诗与思的聚合,蕴含着某种虚化的梦境或儿童化的想象,而和时间保持对话的回溯性叙事则力图寻找隐藏于时间迷雾中的真实。回忆这一审美心理所内含的两种演绎图式即偏重于情感的"想象"与偏重于省思的"对话"的共存,使得回忆性的现代童年书写获得了富有张力的诗性审美空间。

关键词 童年书写 回忆 诗性 想象 对话

谈凤霞,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10097

中国现代(成人)文学中的童年书写于五四时期浮出地表,在近百年来或隐或显的发展中以其浓郁的生命意识推进着中国现代文学中"人"的发现与建构,具有诗性的生命启蒙意旨,同时也因其回望童年生命的创作姿态而生成了独特的诗性艺术质地。回忆是富于诗的品格的一种心智活动,与文艺审美关系密切,它是作为诗化感受和理性观照的"诗与思"的聚合。回忆作为对时间的充分个性化的感知方式,凝聚着作家对于生命独特的感受与认识并形成其独特的艺术世界。本文分析童年书写中"回忆"这一时间感知方式及其带来的艺术表现方式,探讨寓于童年书写文本之中的作家审美心理体验的深度及其诗学创造的途径。

一

童年书写中鲜明的回忆意向决定了一种保持时间距离的书写方式,形成了"距离"修辞及诗化效果。汪曾祺曾把小说比作是回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1]童年书写的回忆中隔着漫长的人生时光,大多已经"除尽火气",这就意味着童年书写含蕴着接近"诗美"的极大可能。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英儿童文学比较研究"(立项号 10YJC751077)的阶段性成果。

[1]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汪曾祺自选集》,〔桂林〕漓江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51 页。

《道德经》的美学特色与翻译

杨　柳　　范　娟

内容提要　通过比较分析《道德经》原典中的母性之美、辩证之美、玄妙之美以及理雅各、韦利、林语堂和巴姆等多位译者的《道德经》英译本中相应的美学传译效果，本文揭示了《道德经》在英译过程中的审美问题，探讨了《道德经》的美学意蕴在英译过程中的再现和表现手法，并指出了今后的翻译传播策略与方向。

关键词　《道德经》　美学特征　翻译

杨　柳，南京大学教授　　210093
范　娟，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10093

《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经典之一，是老子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包括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辩证论、人生论、政治论、军事论、语言论和审美论等多重思想体系，不仅有着重要的哲学意义和文学意义，同时也因其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而享誉世界，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迄今为止，已有近 600 个《道德经》译本问世，展现出道家思想的无穷魅力。

在本文中，笔者将从《道德经》的原典及其美学意蕴出发，探讨这部经典著作在译介与传播过程中的审美再现和表现问题，揭示审美与文本接受之间的关系。

一、母性之美与译者之歧

老子以母性为美，其母性思想在《道德经》中贯穿始终。从第一章开始到以后的许多章节中，老子多次论述母性观。他认为“道”具有母性特质，把母子关系比喻为根本（道）和万物的关系，还十分强调女性的阴柔，认为柔能克刚，女性至上。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些精辟的论断，形象地表现了老子母性观的深刻内涵。总而言之，老子的母性观可以概括为：阴柔、处下、无争、静谧。这些观点与老子所倡导的“无为”精神不谋而合，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从政打仗，都不要急功近利，要怀抱谦卑之心，只有这样才能明哲保身，无为而获。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又是如何传达老子的母性观的呢？下面，笔者以理雅各（James Legge）、韦利（Arthur Waley）、林语堂和巴姆（Archile Bahm）等译者的译本为

本文系南京大学 985 项目“跨文化与全球化”和 2013 年国家留学基金项目的部分成果。